

非行者言

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刘伟才◆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非行者言

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刘伟才◆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行者言: 19 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 刘伟才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520 - 2295 - 7

I. ①非… II. ①刘… III. ①非洲—近代史—史料
IV. ①K4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7505 号

非行者言

——19 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著 者: 刘伟才

责任编辑: 路征远

封面设计: 裴幼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109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0 - 2295 - 7/K · 441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非洲经济史》”(项目编号: 14ZDB063)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高原学科世界史建设项目资助。

序言

另辟蹊径的研究

19 世纪是非洲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

英国工业革命后,拓展海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作为巨大的经济动因,推动英国工业资本改变了以往对于非洲的政策,即从掠夺当地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到把非洲建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消费市场。然而,要完成这个目标,英国遭遇了许多难题:首先,持续了 300 年的奴隶贸易使非洲丧失了大量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直接扰乱和破坏了非洲各地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因此,奴隶贸易的继续存在,将直接威胁非洲成为西方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的前景。其次,直至 18 世纪末,尽管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大陆从事奴隶贸易已经持续三个多世纪,但是它们对于非洲大陆仍然知之甚少。在他们眼中,非洲大陆只是一条海岸线,而不是一块大陆,90% 以上的地区依然鲜为人知。究其原因,非洲内陆复杂难行的地形(广袤的沙漠、热带雨林等)、酷热的气候、各种致命的流行病以及非洲人民的敌视,使欧洲殖民者难以进入内陆地区。18 世纪末,非洲地图还是“一大片空白,而地理学家……犹豫不决地在空白的地图上画上几条未经勘察的河流和几个未经确定的国家的名字”。因此,不破除对于非洲内陆的无知,要在非洲建立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同样是一句空话。

为了解决上述难题,代表英国工业资本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提出了通

商(Commerce)、传教(Christianity)、文明(Civilization)和殖民(Colonization)的方案,被称为“四C”连祷词。所谓通商,即以合法贸易为大旗,一方面迅速剿灭奴隶贸易,另一方面则掠夺当地原料,倾销其工业产品。所谓传教,即以传播基督福音为手段,瓦解非洲传统宗教,输入西方宗教。所谓文明,即强行灌输西方文明理念,瓦解非洲传统文明,通过宣传、办学、办医院等手段,对非洲实施文化侵略。所谓殖民,则是通过上述活动,使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即西方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

为了实施上述政策,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禁止奴隶贸易。英国于1807年正式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其后又迫使其他西方国家废除奴隶贸易。英国以巡查为名,派遣海军进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非洲港口。

第二,对非洲内陆进行考察。1788年,英国成立“非洲内陆探险促进协会”(亦称“非洲协会”),开启了英国对于非洲内陆的探险考察。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批探险队进入非洲内陆,对非洲内陆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考察。

第三,派遣传教士进入非洲内陆。在传播基督福音的旗号下,西方掀起了传教活动的高潮。基督教新老教派纷纷成立传教组织,诸如伦敦宣教会、英国行教会、浸礼会和白衣神父会等,派遣传教士进入非洲内陆建立教堂和教会,进行传教活动。

第四,在禁止奴隶贸易的同时,英国商人高举“合法贸易”的大旗,进入内陆,开展商业活动。

19世纪,进入非洲内陆活动的主要是英国人,也有一些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等,他们是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科学家、军官、政府官员等。尽管他们的职业不同、国籍不同、进入非洲活动的出发点不同,但是有一个目的是相同的,即了解非洲内陆的地理环境、经济活动、物产、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英国人的内陆活动,基本上实现了西方工业资本的政策目标,即打破了西方对于非洲内陆的无知,客观上为日后西方入侵和统治非洲创造了条件。

19世纪,西方在非洲的活动,在非洲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国内学界的研究并不充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发表过数篇文章,内容主要集中于关于禁止奴隶贸易和内陆探险的起因及其影响,对于重要的探险家和传教士也做了初步的剖析。这些研究大多还是从政治史或者经济史角度出发。

刘伟才博士的新作《非行者言:19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也聚焦于这个领域,但是颇有一些新意。

首先,这项研究为19世纪的非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国内以往的同类研究都以政治史或者经济史的视角出发,主要剖析19世纪的内陆探险、禁止奴隶贸易以及传教活动的社会历史背景,强调工业革命后西方对于非洲殖民政策所产生的变化,以及非洲传统经济受到的冲击。而本书作者却另辟蹊径,从非洲史学史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英国人在非洲活动的各种记录作为历史资料进行剖析。必须指出,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尤其是古代史,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是缺乏文字资料,这与当地流行口述文化而没有文字记录直接有关。19世纪,以英国人为主的西方人深入非洲内陆,他们把沿途的所见所闻笔录下来,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文字资料。整理和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非洲古代史的资料不足。这些资料有助于了解非洲传统社会,有助于深入剖析这一时期西方对非政策的演变,有助于了解内陆探险期间探险家们的探险历程。

其次,作者对于19世纪进入非洲内陆的英国人进行分类,划分为探险家、传教士、商人、殖民军人或者殖民官员。由于职业不同,他们在非洲的活动方式与目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的分类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通过对于各种职业人员的记录的分析,便于发现各类人员不同的活动内容、活动方式,及其对于非洲社会产生的影响。如果综合起来,也能够发现英国人活动的总体目的。

再次,作者对于19世纪进入非洲内陆的西方人的文字资料内容进行进

一步分析。把它们分门别类为：关于经济史的资料；关于社会文化史的资料；关于族群、酋邦或者王国史的资料；关于重要历史人物的资料；关于重要历史进程或者事件的资料；关于特定地区的资料和图像资料。科学的分类便于了解 19 世纪进入非洲内陆的英国人所留资料的整体内容和涉及的方方面面，为使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指导。

第四，19 世纪进入非洲内陆的英国人所留下的有关资料数量多、内容丰富。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料？作者为此提出了按题索据、交集与连续、比较与互证以及与其他类型资料的结合等四种方法。这些方法具有一定的运用价值。

总之，《非行者言：19 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的出版，是国内非洲历史研究中一项具有开创性和学术价值的成果，它提供了研究 19 世纪以及之前的非洲历史的一个新视角。当然，作者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我们期望今后出现更多的研究成果。

舒运国

2018 年 4 月 9 日

目 录

序言 另辟蹊径的研究	...1
第一章 非洲史研究中的资料问题	...1
一、问题的提出	...2
二、考古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3
三、口述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11
四、语言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17
五、人类学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22
六、外部文字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26
第二章 19 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的基本情况	...28
一、探险家记录	...29
二、传教士记录	...35
三、商人记录	...41
四、殖民军人/官员记录	...46

五、相关非英国人记录	...50
第三章 19 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包含的史料	...55
一、经济史资料	...56
二、社会文化史资料	...66
三、族群、酋邦或王国史资料	...72
四、关于重要历史人物的资料	...78
五、关于重要历史进程或事件的资料	...82
六、关于特定地区的资料	...89
七、图像资料	...92
第四章 19 世纪英国人非洲行居记录资料的利用	...95
一、按题索据	...95
二、交集与连续	...100
三、比较与互证	...105
四、与其他类型资料的结合	...113
结语 进一步的探索	...117

第一章

非洲史研究中的资料问题

非洲史研究面临的头一个问题是资料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非洲大片地区长期未能创制自己的文字。除北非、撒哈拉-萨赫勒、东北非和东非沿海地区外，非洲大片地区长期处于无文字状态。一些无文字地区后来成了有文字社会，但首先不能否认的是，部分地区的文字具有鲜明的外部性；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地区成为有文字社会已是较晚近的时候。这样一来，问题就变成：外部性的文字如何呈现内部性的东西？较晚近有文字者之前的岁月该如何处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裹挟之下,因无文字或少文字而导致的历史书写困难被看作是非洲落后的一个标志,其中自不乏外界对非洲的歧视和贬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存在的问题。而在非洲民族主义的浪潮中,一些人又在敏感脆弱的自尊心支配下刻意地试图反击,整出一套“非洲特殊论”,认为在无文字或少文字的条件下也可以很好地书写历史,非洲并不一定要遵从外部或所谓“文明世界”的那一套。

将“无文字”等同于“无历史”不可接受,认为没有文字也可以很好地书写历史同样也需要慎重。问题始终在于,要尽可能地弄清问题。除了那些不由分说的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抱着愤激情绪的非洲民族主义者外,也还有一些人是比较单纯地抱着要把一些问题搞清楚的动机去努力,他们会尽力寻找文字资料,同时尽力在文字资料缺失或匮乏的客观现实下去寻找别的可能。

“二战”结束后,非洲掀起民族主义和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潮,对非洲史进行研究成为非洲民族主义者和殖民宗主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英国开始严肃地考虑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非洲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并选定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的人主持相关工作。东非与非洲学院的西里尔·菲利普斯(Cyril Philips)首先前往东非调研,他对非洲史资料搜集和保存工作的薄弱感到惊讶。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英国人研究的非洲只是英帝国的非洲,而不是非洲人的非洲。经过实地调研后,菲利普斯提议就非洲史研究设立两个专门职位,一个职位的担任者留驻伦敦大学,另一个则去往非洲。^① 1948年,罗兰·奥利弗(Roland Oliver)被聘为东方与非洲学院的非洲史讲师;而另外

^① Jan Vansina, *Living with Afric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p. 46.

一个被选聘的人是约翰·费奇(John Fage),他于1949年前往黄金海岸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the Gold Coast)。1949年,奥利弗也去往非洲,先至加纳,然后前往乌干达和肯尼亚。1950年返回伦敦后,奥利弗设立了非洲史学术研讨班,开始培养首批非洲史研究生。

正是奥利弗和费奇这两个人,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非洲史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1948年,尼日利亚的肯尼斯·戴克(Kenneth O. Dike)开始在尼日利亚收集口述资料用于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①这可以说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家开始对非洲史进行研究的标志。

奥利弗和费奇等一众研究者是来自有文字世界,当发现非洲无文字的困难时,他们直白尖锐地指出了问题,但仍然努力寻求解决问题。戴克等民族主义史家源出于无文字世界,他们刻意地想去证明没有文字资料也能写出非洲史,但实际上仍然只能在尽可能的程度上去利用文字资料和文字本身。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往后,考古资料、口述资料、语言资料、人类学资料乃至一些自然科学成果等开始得到重视、发掘和利用,非洲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被“颤颤巍巍”地书写出来:这些历史有的没有明确的时空信息和/或明确的人物,“可能”或类似的言辞在行文中常常出现。在这一过程中,欧美学者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他们无法逾越或暂时无法逾越一些客观的障碍;非洲的一些民族主义史家也进行了努力和尝试,但这些努力和尝试却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非洲民族主义和黑人种族主义方面的情绪——当这些情绪逐渐冷却时,问题仍然在那里。

二、考古资料与非洲史研究

在文字资料外,考古资料是历史研究最可倚赖者,但是非洲考古资料的

^① Jan Vansina, *Living with Afric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p. 41.

情况也不容乐观。

一方面,非洲的可考古遗存相对较少,特别是中南部非洲主要以有机材料制作生产生活器物的大片地区;另一方面,考古活动需要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发掘、测量和研究工作需要较多的财力和物力投入,特别是还需要相应的技术和设备,对于广大欠发达的非洲国家来说,把考古事业做好还并非其发展水平所能及。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非洲人的考古意识和考古能力仍比较薄弱,相应所取得的考古成果也仍比较单薄。从非洲大陆层面来说,非洲现有的考古发现成果从数量上来说仍属微不足道,且呈现区域和领域的明显不平衡;从具体的国别或区域来说,考古发现往往比较单一,遗址遗存要么数量极少,要么具有同质性。

非洲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可以分成如下几类:人类起源与发展考古、史前文明考古、北非文明考古、东北非文明考古、西非文明考古、赤道地区文明考古、东非海岸文明考古、东南非石建文明考古、南部非洲近世人群活动遗迹遗存考古。^①

非洲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围绕这一主题,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东非-东南非作了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也收获了很多成果。在南非等地,由于采矿活动较多,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比较容易地找到了很多人科动物特别是“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的化石,一些人认为南方古猿属于人类的早期祖先;在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以利基家族(The Leakeys)成员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除了发现多种南方古猿化石外,还进一步发现了“能人”等他们认为离现代人更近的人科动物化石。不得不说,相关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非洲的长期努力工作令人钦佩。但遗憾的是,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以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证据来看,总体情况是推测多于定论。

① 关于非洲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的基本情况,可参考:Graham Connah, *Forgotten Africa: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rchaeology*, Routledge, 2004.

非洲史前文明考古伴随人类起源考古而扩展。考古学家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峡谷(Olduvai Gorge)发现了年代最早的砍砸器和手斧;在赞比亚的卡兰博瀑布(Kalambo Falls)发现了大量的砍砸器和手斧,还有修饰过的石片工具、尖状器乃至木棒、木铲等;在肯尼亚的奥洛格赛列(Olorgesailie)发现了较大面积的石制人工物品散布遗存;在南非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地区发现了居住地结构遗存。总体来看,除了样本数量不够和同质性问题外,研究者还面临概念框架和术语使用的问题:能不能把欧亚关于史前文明的概念框架和术语套用在非洲?事实证明,套用会有很多问题,但不套用也不行,因为以非洲现有的考古发现还很难立起一个属于非洲自己的框架和一套属于非洲自己的术语。

人类起源问题考古和史前文明考古包含了历史研究,但也超越于历史研究之外,单纯的历史研究者实际上很难置喙。

围绕北非和东北非文明进行的考古较为发达。古埃及迦太基之类自不必说,但它们似乎游离于一般所理解的非洲之外,或许将其归入与欧亚联系更密切的“地中海世界”更合适一些。即便是库施(Kush)、阿克苏姆(Axum)和东非海岸,就考古而言,也往往要将它们与古埃及、地中海世界、西南亚、南亚等进行联系。至于南部非洲近世人群活动遗迹遗存考古,则更多地与南部非洲的白人相关。

西非文明考古、赤道地区文明考古和东南非石建文明考古或许更能代表真正的非洲。

在西非,有针对廷巴克图(Timbucto)、杰内(Jenne)等古城的考古,有“洛克文化”(Nok Culture)的发现,有包含独特艺术的贝宁城(Benin);在赤道地区,人们根据发现的陶器来辨识和还原雨林地区人们的生活;在东南非,则有以天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为代表的一系列石建遗址。基于这些考古发现开展的研究,填补了非洲前殖民时代历史的部分空白,但相关成果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最常见的是以点带面,基于一处遗址或遗存来写整个地

区的历史;再就是不由分说地强调本土内生性,在数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拒绝一切质疑非洲人能动性的解释。就此,我们可以以天津巴布韦遗址为例来进行阐述。

天津巴布韦遗址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是一个冷静的专业研究者认为仍不能妄下定论的问题,而这一遗址恰恰是最为世人所知的、不容否定的非洲文明象征之一。

在涉及今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南非和博茨瓦纳的大片地方,有一系列石建遗址。除天津巴布韦外,还有卡哈米遗址(Khami)、豹山遗址(Leopard's Kopje)、马庞古布韦遗址(Mapungubwe)等。围绕这些石建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深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非洲民族主义等因素的交织影响。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天津巴布韦遗址的发现、考古和研究史。

早在16世纪时,进入东南非内陆的葡萄牙人就听说过石建的存在。1531年,葡萄牙人佩加多(Vicente Pegado)曾写下文字提起这座石建: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内陆平原的金矿区有一座非常大的堡垒。这名葡萄牙人还比较细致地描述了这座石建的一些特点:石建为群山环绕,砌建似乎没有使用灰泥,有一座高塔。但是,关于这座石建的更多细节,特别这座石建的占据者及周边的居民是个什么情况,这名葡萄牙人并没有说清楚。

1867年——距葡萄牙人首次用文字记录已经300多年了,一名从事狩猎、贸易和探矿活动的白人亚当·伦德尔(Adam Render)从南非的索特潘斯堡(Soutpansberg)出发,越过林波波河进入今天的津巴布韦进行狩猎,然后他就看到了天津巴布韦。此后,伦德尔在天津巴布韦东南方约20公里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1871年,德国探险家、地理学家卡尔·毛赫(Karl Mauch)找到伦德尔,与伦德尔一起对天津巴布韦进行了数次探查。毛赫将自己的探查记录发给自己的同事和德国的报纸,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以为是毛赫发现了天津巴布韦。毛赫当时这样描述天津巴布韦:石建遗存分布于从山顶到山脚的广大

区域,大部分已坍塌并被草树杂物覆盖。毛赫并不能确定这些建筑到底作何用,但他推断应是作堡垒用。在并没有进行科学的发掘、测量、遗物搜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的情况下,毛赫就大胆地推测石建可能跟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有联系——其实早前已有葡萄牙传教士论及此。在此推测支配之下,毛赫把他在石建遗址找到的一条楣梁看作是由黎巴嫩雪松木制造,而雪松木则是由腓尼基人带至;进一步推导,毛赫称大津巴布韦是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神庙的模仿品。

1891年,一位富有的英国旅行家和古物学家本特(Theodore Bent)与他的妻子一道对大津巴布韦进行了调查研究,他在1892年出版的《马绍纳兰的城墟》中提出,大津巴布韦可能是古代的腓尼基人或者阿拉伯人建造的。^①在1902年版的《马绍纳兰的城墟》中,本特进一步称大津巴布韦应是由闪米特的阿拉伯种人建造,他们是重商者,而石建是他们在非洲的商务基地或办事处。^②

1904年,另两位研究者——霍尔(Richard Nicklin Hall)和尼尔(W. G. Neal)——又进一步对毛赫和本特的观点进行了演绎。他们对包括大津巴布韦在内的多处石建遗址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利用了其他多人对相关石建遗址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表示认可盛行的罗得西亚(当时的称谓)境内的石建与南阿拉伯人和腓尼基人密切相关的观点,并提出“罗得西亚-俄斐论”(The Rhodesia-Ophir Theory),认为罗得西亚就是《圣经》所说的俄斐(Ophir)。但两人也表示,罗得西亚境内的石建遗址还并未得到全面而充分的调查研究,因此并不能排除会出现其他的解释。^③

① J. Theodore Bent, *The Ruined Cities of Mashonaland: Being A Record of Excav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1891*,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2.

② J. Theodore Bent, *The Ruined Cities of Mashonaland: Being A Record of Excavation and Exploration in 1891*,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2.

③ Richard Nicklin Hall and W. G. Neal, *The Ancient Ruins of Rhodesia*, Methuen & Co., 1904.